学术专论

乾隆帝推崇岳飞考论

陈兆肆　王　亮

[摘要] 乾隆帝对岳飞特加推崇，不仅异于先人，甚与明朝相较亦不遑多让。究其原因，客观上，此时大一统基本底定，满汉矛盾趋于缓和，岳飞作为反清大纛的色彩已然淡化；主观上，乾隆帝意欲通过推崇岳飞，为臣工深植忠孝纲常，强化疆域一统的“正统观”，为华夏立先贤，亦有借机标榜和展示自我的考量。其影响所及，使岳飞从汉人英雄逐渐变成中华各族共同敬仰之英雄。

[关键词] 清朝　乾隆帝　岳飞　推崇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4）–05–0095–15

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忠孝节义的楷模，抗敌（金）御侮的典范，以及智勇双全的良将形象，自宋以降渐为后世所崇敬。不过，伴随中华内部各族关系的变化，以及“华夷之辨”思想的此消彼长，不同阶段对待岳飞的态度有所不同。比如北方边患几乎贯穿始终的明朝，即对岳飞有着特殊的推崇。而以满洲入主中原且以金之后裔自居的清初帝王，则对岳飞表现出某种欲拒还迎的暧昧之态，并非全盘肯定，亦未悉数否定。不过，这一状况至乾隆朝发生显著改变。乾隆帝旗帜鲜明地推崇岳飞，不仅迥异先人，甚与明朝相较亦不遑多让。其背后之因及影响值得探究。

关于乾隆帝对岳飞的特别推崇，学界已有部分研究略涉于此，但尚未见有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孙江、黄东兰从“追念生”“记忆死”“岳庙之境遇”等不同面相，探讨元明清王朝、中华民国、新中国等各阶段岳飞叙述和记忆的“当代史”意义，尤为集矢于岳飞叙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之间的关联性。[①] 黄东兰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整合的视角，探究岳王庙这一场域中的公共记忆的形塑。[②] 上述研究均指出岳飞叙述和记忆具有鲜明的“当代史”意义，跳掷于君臣之义、华裔之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思想之间，进而展现出不同阶段的岳飞叙述与岳飞本事之间的距离。这些探讨对后来者的研究深具启发之效。但是，因涉及时间跨度较长，加之理

[收稿日期] 2024–02–24
[作者简介] 陈兆肆（1982—　），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杭州 311121，tingmengxuan@163.com；王亮（2002—　），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杭州 311121
[基金项目] 国家民委民族研究课题“清朝前中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2022–GMI–084）成果。

①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龚延明、祖慧主编:《岳飞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5–41 页。

② 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58–177 页。

论偏向，上述研究对清代相关历史细节的考论不免疏阔。包伟民对岳飞身后形象之变迁作出精彩讨论，唯其聚焦于南宋中后期。①20 世纪 70 年代，李安曾对清乾隆帝特别敬重岳飞一事作过疏解，认为乾隆帝既注意文教，又重视武功，故对文武兼资、天赋忠孝的岳飞崇敬有加。② 李安的研究提示我们，或可从个人情感维度来探讨乾隆帝对岳飞的相惜之情，但作为一国之君的乾隆帝对岳飞推崇的政治深意及后续广泛影响，李文未有措意。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反映时人内心幽隐的咏吊诗文、祭词，辅以实录、方志等，深入探讨乾隆帝对岳飞特加推崇之背景、表现、原因，尤其是这一推崇对形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价值认同所产生的至深影响。

一、从明朝的倍加尊崇到清初诸帝的欲迎还拒

孙江、黄东兰指出："在皇权体制下，我们可以把岳飞定格在三个不同的关系里：君臣之义的上下关系；忠奸之分的平行关系；华夷之辨的内外关系。"③ 就前两层关系而言，除南宋会稍有避讳外，后世王朝对岳飞之忠义皆持正面肯定态度；但在"华夷之辨"的内外关系一层，南宋以后的不同王朝所持态度不一。一般认为，南宋与明朝的北边之患，促使他们对岳飞日益推崇，而元朝与清朝则因其统治者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岳飞采取一定的抑制态度。虽具体情况要更为复杂，如乾隆帝对岳飞的特加推崇显然是个例外，但针对乾隆朝之前，这样的判断总体上是契合历史实情的。

（一）明朝对岳飞的倍加尊崇

清人梁章钜曾言："相传每朝之兴，必有尊神为之护国。前明为岳忠武，我大清则奉关帝为护国。"④ 岳飞为明朝护国尊神的说法或有夸张，但相较其他王朝，明代帝王对岳飞的尊崇确实无以复加。明太祖朱元璋评价岳飞"纯正不曲，书如其人"，并以其从祀历代帝王庙，配宋太祖享。⑤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封岳飞为"宋少保鄂国武穆王"，规定每岁岳飞忌日，即十二月二十九日，派官致祭杭州岳王庙。⑥ 此举为国家权力正式介入岳飞祭祀之嚆矢。此后，明宣宗朱瞻基在诗中对岳飞的精神价值作出全面界定，诗曰："南宋推四将，岳飞为第一。仁信智勇严，五者一不失。精忠誓报国，书背皦白日。"⑦ 明代宗朱祁钰即位伊始，便应徐有贞之请在岳飞故里汤阴建岳飞庙，声势颇大，此为汤阴岳飞庙之肇端。⑧ 嘉靖十八年（1813），明世宗朱厚熜亲至汤阴岳飞庙，并谕令靖远伯王瑾举行祭祀。⑨ 万历四十三年（1615），明神宗朱翊钧加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⑩ 将其抬至神明大帝的高度，这在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崇祯十五年（1642），明思宗朱由检在经筵听讲时论及岳飞，发出如是感叹："安得将如岳飞者而用之？"⑪ 言语之间，在慨叹时下忠臣良将难寻之余，对岳飞赞誉有加。

除帝王外，社会上对岳飞的推崇也在明朝达到极致。傅炳熙等曾对宋元明清咏岳飞之作进

① 包伟民：《关于岳飞身后形象变迁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2023 年第 3 期。
② 李安：《岳飞史迹考》，正中书局，1970 年，第 435–438 页。
③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第 27 页。
④ 梁章钜编：《楹联丛话》，商务印书馆，1937 年，第 267 页。
⑤ 民国《淮阳县志》卷 8《艺文志》。
⑥ 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第 163 页。
⑦《明宣德皇帝御制集》卷 18，明内府朱丝栏钞本。
⑧ 殷时学、陶涛主编：《岳飞庙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 页。
⑨ 殷时学、陶涛主编：《岳飞庙志》，第 273 页。
⑩ 李调元：《童山集》文集卷 8，道光五年增修本，第 11 页。
⑪ 郭皓政、甘宏伟编著：《明代状元史料汇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434 页。

行辑录，其中南宋作品 64 首，元代作品 74 首，明代作品 731 首。[①] 可见，明代咏岳之作，相较于前，数量激增。此外，明代演绎岳飞故事的文学作品，亦极一时之盛。[②] 是时，各地岳庙也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肇建于明景泰年间的汤阴岳飞庙，先后于弘治十年（1497）、正德五年（1515）、万历年间（1572—1620）、天启二年（1622）得到一再重修，其重修扩建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可谓空前。[③] 而杭州的岳庙，更是在洪武四年复建后，又历经宣德、景泰、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天启数朝共十余次的重修和扩建。[④] 除此两大极具典范意义的岳庙外，其他一些地区对岳飞的建庙崇祀活动，亦如雨后春笋。[⑤]

明代"借才于异代"而对岳飞特表崇敬，与几乎贯穿始终且于中后期尤形严重的北疆危机密切相关。对岳飞颇事推崇的明太祖，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讨伐元朝。[⑥] 作诗褒扬岳飞的明宣宗，少时曾多次随祖父朱棣征战边塞，且在咏岳诗中有"所向无不捷，丑虏皆胆栗"[⑦] 一句，指向十分明确。明代宗批准汤阴岳飞庙建立之年，正值明英宗被瓦剌所俘，是为明朝遭受巨创的"土木堡之变"的次年。明神宗在位后期，建州女真崛起，渐成心腹大患，其加封岳飞"三界靖魔大帝"之时，又恰处于努尔哈赤建国之前夕。天启二年，汤阴岳庙再度重修之时，是明朝自万历四十六年以来应对努尔哈赤军事逼压后的第五年，明人董其昌在相关碑记中如是提及：历经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明军对清之战屡以败北告终，"糜军兴以千百万计，征戍卒以数十万计，而搴旗罔效，舆尸屡闻，至于全军覆没，全辽沦丧"；而此次重修岳庙，崇严祠典，旌表忠勇，激励官民，旨在"戡乱之时，表章尤急，虽非借才于异代，实可激耻于懦夫"。[⑧] 而前揭崇祯帝叹朝中无"岳飞"可用之日，正值皇太极赢得松锦大战之时，此时明朝的宁锦防线彻底崩溃，清军对中原的逼压之势日甚一日。

凡此种种皆反映出，明代帝王对岳飞的推崇，实与始而为北边蒙古之患继则为东陲满洲之患关联甚切。民间对岳飞的推崇，亦有类于此。这些推崇活动的高潮点，正处于明朝北边之患日亟的中后期。孙江、黄东兰指出，土木堡之变后，"各地纷纷修建岳飞庙，重刊岳飞集，文人士子题咏岳飞的诗文增多，岳飞杂剧不断涌现"。[⑨] 明朝民间对岳飞的推崇话语中，笼罩着一层浓厚的"逐虏"色彩。

（二）明清鼎革之际士民眼中"护明反清"的岳飞

明清易代之际，明人"华夷之辨"中的华、夷，其现实指涉即为明与清。因此，在常人眼中，"岳飞"自然是护明反清的象征性符号，而况满人又确以金之后裔自居。最典型的是，明末清初不少士人在咏吊岳飞的诗句中，将历史与现实勾连，借对岳飞的咏怀直抒"抗清护明"意与"反清思明"心。

明末董应举曾作《题岳王庙》一首，其中"今日奴酋昔女真，岳王忠愤未能伸"[⑩] 一句，即指明了威胁明代边疆的建州女真与历史上岳飞所抗击之金人间的延续性，并将现实之忠愤与岳

① 傅炳熙、傅乃芹辑校：《宋元明清咏岳飞广辑》，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年。
② 李琳：《明代岳飞故事小说考论》，《江汉论坛》2014 年第 2 期。
③ 殷时学、陶涛主编：《岳飞庙志》，第 3-4 页。
④ 李慧敏、沈立新主编：《杭州西湖岳王庙志》，杭州出版社，2012 年，第 70-71 页。
⑤ 康熙《泰兴县志》卷 4《祠祀第十六・岳王庙》；同治《祁门县志》卷 9《舆地志・坛庙》；嘉靖《九江府志》卷 8《职官志・祀典》；乾隆《广德州志》卷 12《营建志・坛庙》。
⑥ 《皇明政要》卷 14《正法令第二十八》。
⑦ 《明宣德皇帝御制集》卷 18，明内府朱丝栏钞本。
⑧ 董其昌：《汤阴县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容台集》上，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年，第 289 页。
⑨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第 20 页。
⑩ 董应举：《题岳王庙》，《崇相集・诗》，《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02 册，北京出版社，1998 年，第 378 页。

飞之忠愤合而为一。余绍祉作《岳忠武墓》，大呼："敌骑今方骋，将军速起来。"①"敌骑"一词，含混了岳飞之敌与有明之敌，表达了欲起岳飞于九泉之下以抗金，以及时下良将难得的双重感慨。与"抗清之心"一体的，是"护明之愿"。崇祯年间，官员黄建中祭祀汤阴岳飞庙时，感于时势，赋《题岳忠武祠》一首，其中"维桑血食高千古，愿借精忠护大明"②一句，欲借岳飞"精忠"护佑明朝；明末诗人李达在吊岳诗《过岳武穆祠》中，有"即今羯虏窥关日，正是忠臣报国时"一句，③而北骑正是指日益强大的关外清军，此时亟需忠臣报国。

明朝在北部边患日亟的中后期，对岳飞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实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即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关外清军的逼压，投清不忠者不乏其人，如祖大寿、洪承畴等，而在军事上明军亦连连败北，进而出现"忠勇智兼备"之良将难得的窘境。表彰岳飞之文武忠良，无疑具有镜鉴明耻和激励奋进的双重之效。

借咏岳诗以感慨明清易代的做法，在清初仍有延续。但格于"大局已定"的现实，与明末诗歌中的壮怀激烈颇为不同，清初之人多流于感伤，而于咏吊岳飞之诗中多表"念明思明"之意。如屈大均作《和人岳王墓》，抒"鄂王坟上哭南朝，身落钱塘作暮朝"④之悲；刘廷玑作《岳王坟》，发"墓前铁铸秦丞相，儿女何知笑骂同"⑤之叹；徐釚作《岳鄂王墓》，表"登临休问前朝事，只有南枝恨未消"⑥之憾。

（三）清初诸帝对岳飞欲迎还拒暧昧之态

作为历史人物的岳飞，在前揭明朝诸帝和士人的口中被反复言说，逐渐成为反清（抗金）的一杆大纛。清初统治者出于现实的多重需要，对岳飞采取了一种选择性接受的暧昧态度——欲迎还拒。

需注意的是，清朝肇建之初，岳飞仍被一些"反清复明"之士视作楷模。南明儒将张煌言常以岳飞自勉，并在诗中表达对岳飞的敬佩之情。顺治元年（1644），张煌言在被俘临死之际，写下"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之句，⑦将两位长眠于西子湖畔的忠肃（即岳飞与于谦）视作自己的先师。此种将"岳飞"符号置于清朝对立面的做法，直到雍正年间依然如故。典型之例莫过于雍正朝的"曾静案"。雍正六年，深受浙西大儒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影响的湘籍书生曾静，听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乃为岳飞后裔，便派学生张熙去送策反信，信中写道："戴皇祖之仇以为君，且守死尽节于其前"。⑧此"皇祖"即系岳飞，曾静之意为：岳钟琪既作为岳飞后裔，而满人又系金之后裔，则岳钟琪当戴先祖之仇，与我等共谋反清大业。曾静之想，洵非个案。在此案前一年，四川成都府发生了一桩诬告岳钟琪造反的"疯汉卢宗案"。此案本不涉及岳飞，但雍正帝为此案写下的批文却耐人寻味，其中一句是："数年以来，在朕前谗谮岳钟琪者甚多，但谤书一箧而已。甚至有谓岳钟琪系岳飞之后，伊意欲修宋金之报复者。其荒唐悖谬，至于此极。"⑨雍正帝口中"荒唐悖谬，至于此极"所针对者，究系"岳钟琪系岳飞后裔"抑或"意欲修宋金之报复"，已难知晓。不过仍可间接看出，在距清入关已逾80年之久的雍正朝，以岳飞为反清大纛的想法和做法仍广泛存在，否则雍正帝亦不必于此案中特意拈出并耿耿于怀。

---

① 余绍祉：《岳忠武墓》，《晚闻堂集》卷4，道光十七年刻本。
② 崇祯《汤阴县志》卷18《诗赋》。
③ 李达：《行季遗诗》，《丛书集成续编》第171册，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第42页。
④ 屈大均：《和人岳王墓》，《道援堂诗》卷8，《四库禁毁书丛刊》集39，第269页。
⑤ 刘廷玑：《岳王坟》，《葛庄分体诗抄》七言律上，《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28页。
⑥ 徐釚：《岳鄂王墓》，《南州草堂集》卷5，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⑦ 张煌言：《八月辞故里拟绝命词二首（其一）》，《张忠烈公集》卷11，清傅氏长恩阁抄本。
⑧《大义觉迷录》卷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32页。
⑨《清世宗实录》卷59，雍正五年七月丁巳。

岳飞符号既久已成为反清之大纛，则不能不引起清初诸帝的一丝顾忌和反感。然而，岳飞作为历史上的模范英雄，其相关事迹在明朝早已被广泛编成戏曲，写入小说，家喻户晓。而这样的作品，在清初仍层出叠见。岳飞的英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此时若欲刻意全面贬低岳飞，又颇不利于重拾民心而维护统治。于此背景下，清初帝王对岳飞表现出某种明褒暗抑、欲迎还拒的暧昧态度，作出了某种选择性的接受。兹以康熙帝《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① 一文为例，以作说明。该文称："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这样的怀疑自有其合理性一面，但其在后文又言，"若使复仇雪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对岳飞用兵的态度，从"不必胜"一变为"实不能"，体现康熙帝对当时岳飞等将主战思想的彻底否定。"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一句，虽未点明岳飞及岳家军，但实则巧妙地将其置于"不惯战"和"不用命"之列，显然是对其作战能力的否定。有学者曾言及："康熙没有正面肯定秦桧，但在降金乞和的问题上，宋高宗与秦桧既是君臣一体，肯定宋高宗'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的政策，无疑也就是肯定秦桧。"② 至若秦桧得到肯定，则康熙帝心目中的岳飞形象如何，便殊值玩味。康熙帝此番宏论名为《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表面上仅是为宋高宗辩白，但就其实质是在批判主战而肯定主和，而这两派的代表人物无疑分别即是岳飞和秦桧。不过，康熙帝措辞相当委婉，力求避免对岳飞的直接批评和对秦桧的直接肯定，他不明贬岳飞与岳家军无用，只说时无"惯战之良将"，无"用命之士卒"；他不显褒赵构等运筹帷幄，只说"久在金营"，"自有切见"。如此委婉的措辞，无疑也反映了康熙帝在评骘岳飞问题上的谨慎和暧昧。

除康熙帝有暗贬岳飞之意外，雍正帝也对岳飞采取一定抑制的态度。明末之际，为褒奖岳飞抗敌御侮之忠，曾下令在祭祀关羽的武庙中增祀岳飞。然至雍正四年（1726），清廷下令将岳飞移出武庙，独尊关羽。③ 而在此前后，雍正帝下令追封关羽三代，诏令天下广建关帝庙，使关羽的地位进一步抬高。④ 李安认为，雍正此举，是在施行"以关代岳"的策略，通过"盛赞关羽之义，以代替岳飞之忠"。⑤"以关代岳"的说法有待商榷，"尊关"的目的未必是"代岳"，但联系前述关于岳钟琪的两则案例可知，雍正帝对岳飞的态度则难言喜爱。

虽然清初帝王对岳飞不甚喜爱，甚至有所抵触，但岳飞之形象本自光辉，加之明朝大力褒崇，社会对岳飞之推崇敬仰已然普遍，对此，他们实无法做到盲目贬岳、排岳，反而在某些方面对岳飞表示认同。顺治年间，清廷议将张浚移除历代帝王庙从祀时，其中一条理由便是："与飞议不和，奏飞欲专兵柄。"⑥ 虽然这极有可能是汉族臣子的主张，但清帝之态度显然也是默认。此外，针对部院之中清官难求的现象，康熙帝在谕旨中援引了岳飞"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的话语，这无疑体现了其对岳飞作为臣子楷模的品格之肯定。但紧跟着此语的是："今观汉诸大臣，凡事不发言，但怂恿满大臣言之，彼则从中自便而已。"⑦ 在敲打"汉臣"的情境中使用岳飞的名言，康熙帝此举不乏讽刺意味。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各地重修岳飞庙的活动依旧不少。尤其是，杭州的岳庙在朝廷的默允下，经地方官绅的共同努力，由战时破落，始则基本恢复，继而踵事增华。顺治八年，作为范仲淹后裔的巡抚范承谟，爱敬岳飞忠烈，捐资重修岳庙；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因殿宇倾圮，在两淮转运使罗文瑜动议下，杭州岳

---

① 爱新觉罗・玄烨：《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康熙政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400–402页。

② 王曾瑜：《从康熙的议论谈宗泽、岳飞等抗金》，《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③《古城足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94页。按，对于雍正四年移岳飞出武庙一事，李安文、孙江文亦皆提及。此一重要事件，保留在地方史志资料中，但不见于《清世宗实录》，或有所讳。

④《清世宗实录》卷31，雍正三年四月庚午。

⑤ 李安：《岳飞史迹考》，第450页；《关帝庙》，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⑥《清世祖实录》卷136，顺治十七年六月己丑。

⑦《清圣祖实录》卷238，康熙四十八年五月丁酉。

庙再次动工维修；康熙三十一年、三十四年，在杭州知府李铎主导下，重修、增修岳庙，使其“规模宏丽，创所未有”；康熙四十七年，浙江总督范时崇再次重修岳庙；雍正九年，闽浙总督李卫重修岳飞墓、庙，并建石牌坊，书“碧血丹心”四字。① 以上重修、增修活动，虽都由汉族地方官自行发起，但清廷皆默许。

总体而言，清初帝王不喜“华夷之辨”层面的岳飞形象，但对“君臣之义”层面作为“臣子楷模”的岳飞形象，仍有维护和表彰之意，加之不便直接抵触社会对岳飞的推崇敬仰，故而呈现出一种欲拒还迎的暧昧之态。

二、乾隆帝对岳飞的特别推崇

清初帝王对岳飞欲拒还迎的暧昧之态，至乾隆朝发生了根本改变。乾隆帝推崇岳飞的态度至为鲜明，“复秩前代旌崇之典”。②

乾隆帝酷爱读史，其对岳飞的相关认知和态度，在其对史书尤其是《通鉴辑览》的研读评论中得以体现。③ 乾隆帝读到明正统帝为蒙古瓦剌部俘虏一段时，对当时群臣畏葸退缩的软弱表现深表不满，进而又联想至南宋岳飞的不俗表现：“如岳飞之力战迎二帝，天下其谁非之？”④ 就中原皇帝被少数民族俘虏而言，宋明两朝皆曾发生，一为靖康之变，一为土木堡之变，故乾隆帝将两者合而思考。在其看来，明英宗被俘，朝中主和者怯懦避战，实则也未必能通过卑躬屈膝而迎回英宗，相反若通过力挫瓦剌而增加谈判筹码，或许尚有迎回之一线希望。正因如此，乾隆帝对当时力排众议而主战之于谦评价甚高，其在南巡期间亦曾赐于谦祠“丹心抗节”的匾额，以示褒奖。⑤ 同样，在乾隆帝看来，岳飞勠力奋战，一雪靖康之耻，意欲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两帝，可谓尽忠报国之举，堂堂正正；而朝野上下所谓“岳家军将骄兵横”“力战则二帝危”“徽钦既返今上何属”之类的言论，均为鼠目寸光、不识大体的无稽之谈。

当乾隆帝读到明人丘濬“岳飞未必能恢复，秦桧有再造功”之论时，如是愤愤评论道：“丘濬谓岳飞之未必能恢复，论虽未当，尚从南渡时势立言……至于秦桧误国之罪，妇孺咸知，而忽许其有再造功，颠倒是非，实足骇人闻听。”⑥ 丘濬称岳军北伐未必能胜，与前述康熙帝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针对丘濬此言，乾隆帝认为虽有未当之处，但溯及宋室南渡时的孱弱之势，转觉有几分道理；然而当丘濬以“再造功臣”许以秦桧时，乾隆帝便碍难容忍，力斥其“颠倒是非、骇人听闻”。因从事实而言，秦桧的求和行为最终加速了南宋的灭亡，还是迟缓其灭亡，或有可商之处；但从道义着眼，替秦桧漂白辩护甚及推许其为再造功臣，则属于是非不分的价值颠倒，是可忍而孰不可忍。乾隆帝评史时的激越之词，足证其本人推崇岳飞并非惺惺作态，确乎有衷心爱敬之情。这些评论表明，乾隆帝充分肯定岳飞的军事主张及能力，并在斥责秦桧奸恶的同时，高扬岳飞之忠义精神。

乾隆四年，乾隆帝专作《岳武穆论》，对岳飞进行全面褒扬：

> 夫北宋之亡，河北之失，宋祚之不复振，中原之不恢复，人皆曰由徽钦而致，然高宗实难逭其责焉。当钦庙北去，社稷为墟，高宗入援，顺人心而即大位，非不正且大也。及即位之后，当卧薪尝胆，思报父兄之仇。而信用汪、黄，贬黜李纲，不复以河北中原为念，岂非高宗庸

① 李慧敏、沈立新主编：《杭州西湖岳王庙志》，杭州出版社，2012 年，第 71–73 页。
② 冯培：《岳庙志略》卷首，第 17 页。
③ 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91 页。
④ 《军旅他非所敢闻目》，刘统勋：《评鉴阐要》卷 11，第 6 页，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⑤ 《清高宗实录》卷 383，乾隆十六年二月戊子。
⑥ 《丘濬议论多偏激尝讥范仲淹多事岳飞未必能恢复秦桧有再造功注》，刘统勋：《评鉴阐要》卷 11，第 16 页。

懦、用人不察之过哉？其后诸将用命，岳武穆以忠智出群之才，率师北驱，所战皆克，而以金牌十二召之班师，淮北之民遮马痛哭曰："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然而，武穆亦不得以自留也。夫如武穆之用兵驭将、勇敢无敌，若韩信、彭越辈，类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无二，则虽古名将，亦有所未逮焉。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呜呼！以公之精诚，虽死于桧之手，而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可与日月争光矣。独不知为高宗者果何心哉？①

对岳飞其人之评骘，必然涉及对当时和战政策的评价。乾隆帝常以乃祖康熙帝之心为心，许多政策亦步亦趋而不越雷池，然而在评价南宋高宗主和政策时，却与乃祖迥不相侔。在康熙帝看来，宋高宗一派主张求和实为明智之举；而乾隆帝则直接指出，南宋初期中原未能恢复，根源在于高宗懦弱求和、用人不察，以及"徽钦既返，此身何属"的个人私意。乾隆帝激烈批评宋高宗，意在彰显岳飞雪耻复国之"报国"志向和遵命撤退之"忠君"情怀。在其看来，两者都体现出一种"忘身奉献"的精神。乾隆帝认为，宋高宗的昏聩之处正在于：对待岳飞，未能于"报国"和"忠君"方面两全其美，而是以一种残忍的方式带来其"以死忠君"的悲壮，而在"报国"一端上，却致其中道折戟而壮志未酬。此外，乾隆帝以长时段的眼光，首先诉之于往者可追，对岳飞予以全面肯定，认为其"文武兼备、仁智并施、精忠无二，则虽古名将亦有所未逮焉"；其次诉之于来者可谏，认为岳飞的精神价值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即"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可与日月争光矣"。乾隆帝此论言近而旨远，隐然有所针对其当时，冀望忠臣与明君能相得益彰、各得其所：一方面，敲打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必须无条件做到"忠君"，甚及"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不知惜己命"；另一方面，自身则以宋高宗为戒，以知人善任、励精图治的明君而自我期赏。

乾隆帝对岳飞的格外推崇，还体现在南巡期间拜谒岳庙、遣官致祭、赋诗褒扬等一系列做法上。南巡期间，乾隆帝之于各地岳庙，每每突破元明以来有司例行化的春秋两祭之礼，逾格以待。对此，乾隆朝钱塘人冯培在《岳庙志略》中如是感叹：

鄂国自宋隆兴初年昭雪赠复，迄乎元明以来，代有褒崇，然不过春秋二节，有司循例祀享而已，未有如圣朝翠华临幸，钦命大臣致祭，复亲诣祠墓，慨念精忠，宸章稠叠，俾后裔世世尊藏，异数殊荣，诚旷古所希觏！②

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在南巡归途中特地前往岳飞故乡汤阴，亲诣岳飞祠庙，并赋诗一首，对岳飞的"两则臣言"和"百战兵威"等进行褒扬，又派人于仪门内建御碑亭一座，将其诗作刻于碑上，供后人瞻仰。此外，派遣大臣代为致祭，并亲写祭文，祭文中盛赞岳飞"公忠秉性，智勇超伦"。③ 而乾隆六次大规模南巡，每至杭州，皆会派官致祭岳飞祠墓，并每每亲诣。其中，乾隆十六年，其首次南巡至杭州时，撰写祭文，遣大臣多尔济致祭；后亲临祠墓，赐匾额"伟烈纯忠"四字；④ 乾隆二十二年再巡至杭，又撰祭文，遣官刘纶致祭，亦亲临墓所；乾隆二十七年三巡至杭，遣官程岩致祭，谕祭牲品，再临墓所，并命随行大臣进庙行礼；乾隆三十年四巡至杭，遣官孙礼致祭；乾隆四十五年五巡至杭，遣官王灿致祭；乾隆四十九年，其最后一次南巡至杭时，遣官朱珪致祭，特命随行几位皇子行礼于庙墓之前。此外，南巡之皇太后也随乾隆帝多次亲临岳庙。⑤

---

① 爱新觉罗·弘历：《岳武穆论》,《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7页。以下简称"《御制诗文全集》"。

② 冯培：《岳庙志略》卷3《祀典》，光绪五年浙江书局重刊，天津图书馆藏，第3页。

③《岳忠武王全集》，扫叶书房，1927年，第2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383，乾隆十六年二月戊子。

⑤ 冯培：《岳庙志略》卷3《祀典》，第1–2页。

乾隆十六年，御制祭文曰：

惟尔灵钟川岳，忠贯日星。奇质挺生，早裕韬钤之略；英才间出，允扬罴虎之威。身百战以摧锋，军称难撼；规两河而却敌，志切长驱。天鉴丹忠，知精诚之未邈；神栖碧落，凛浩气之长存。朕时迈南邦，巡行浙水。映阶草色，曾观旧庙于汤阴；绕径松风，更抚遗阡于湖屿。爰修秩祀，用遣专官，灵如有知，尚其歆格。①

从其字里行间仍可捕捉到，乾隆帝对岳飞之智谋、英武、忠诚等军事和政治品质全面推崇，力加提倡。正是在乾隆六次南巡期间，杭州地方因“仰体圣天子优奖忠诚至意”，杭州岳庙得以“随时葺治，丹雘焕然”，“鼎新庙貌，以待临幸”。② 此外，据乾隆《江夏县志》记载，该县位于宾阳门内青草坡的一处岳庙，曾于“乾隆三十四年奉恩诏修理”。③ 可见，乾隆帝对于该地岳庙之修理，亦甚重视。

乾隆帝南巡期间，作下不少咏岳诗篇。在其咏岳诗中，与前述《岳武穆论》中的相关评论一脉相承，即一面盛赞岳飞文武双全、忠勇兼济，一面批评南宋君相无德（见表 1）。

表 1　　乾隆帝南巡期间咏吊岳飞诗歌代表作

诗名	内容	时间	出处
《经岳武穆祠》	翠柏红垣见葆祠，羔豚命祭复过之。 两言臣则师千古，百战兵威震一时。 道济长城谁自坏？临安一木本犹支。 故乡俎豆夫何恨，恨是金牌太促期！	乾隆十五年（1750）巡游至汤阴时	《御制诗集》二集卷 21
《岳武穆墓》	读史常思忠孝诚，重瞻宰树拱佳城。 莫须有狱何须恨，义所重人死所轻。 梓里秋风还忆昨，石门古月镇如生。 夜台犹切偏安愤，想对余杭气未平。	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至杭州拜谒岳飞祠时	《御制诗集》二集卷 25
《岳武穆祠》	阵战曾轻兵法常，绍兴亦委设施方。 操戈不谓兴张俊，纳币终成去李光。 何事书生叩马首，遂教名将饮鱼肠。 至今人恨分尸桧，宰树余杭万古芳。	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至杭州拜谒岳飞祠时	《御制诗集》二集卷 70
《岳武穆祠》	黄龙直抵气峥嵘，燕以南金令不行。 正可乘机事恢复，谁知虚力费经营。 爱钱切中文官病，怕死曾轻武士生。 万里长城空自坏，至今冢树恨难平。	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至杭州拜谒岳飞祠时	《御制诗集》三集卷 21
《岳武穆祠》	褒嘉手敕是谁言，何致终衔不白冤。 战必骁腾惊北骑，地争尺寸守中原。 持身忠总根于孝，抚士威还济以恩。 生世漫悲才州九,千秋英气两间存。	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至杭州拜谒岳飞祠时	《御制诗集》三集卷 48
《岳武穆祠》	相过必纪诗，忠勇实嘉之。 屈死夫何恨，每生岂肯为。 存心义有素，报国志无移。 飞白曾观谕，由来情见辞。	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南巡至杭州拜谒岳飞祠时	《御制诗集》四集卷 72

① 《乾隆帝致祭文》碑刻 1，杭州孔庙藏。

② 冯培：《岳庙志略》卷 1《祠墓》，第 4 页。

③ 乾隆《江夏县志》卷 5《祠庙》。

续表

诗名	内容	时间	出处
《题岳武穆墓》	六番经古墓，无不著吟频。 武更文双济，忠兼孝两真。 洞犹金鼓作，世早宋金湮。 新得五经萃，欣他有后人。	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至杭州拜谒岳飞祠时	《御制诗集》五集卷 6

乾隆帝读史时所表现出来对岳飞的激赏，确乎出自衷心爱敬之情，并非全系政治表演。尤值一说的是，乾隆帝在分析岳飞悲剧之幕后主使时，颇似明人文徵明词中所论："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君欲"。其直指宋高宗，不稍瞻顾，非同后世官史率多将主责移置于秦桧之身，从而体现出相当务实求真的历史评判态度。乾隆帝通过一系列隆重的致祭仪式表达崇敬之情，将其一己喜好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显然另有政治考量。

三、乾隆帝推崇岳飞之因

降至乾隆朝，历经清初几代帝王的治理，清朝统治已较稳定，实现了空前的一统局面，满汉矛盾趋于相对缓和，此时毋庸铭记"金（满）—宋（汉）"旧怨而紧绷心弦，而况岳飞作为一种反清符号的威胁也基本不复存在，因此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乾隆帝产生一种超越狭隘的族群本位意识而趋近于相对客观的评岳态度。不过，乾隆帝迥异于先人暧昧之态，旗帜鲜明地全面褒扬岳飞，耐人寻味，其背后之因引人深思。乾隆帝御制《岳武穆论》中"天下后世仰望风烈"一句，可堪深解：其一欲臣子效仿，其二强调一统之广，其三为天下后世树立先贤。

（一）力褒岳飞"精忠"——为臣子植纲常及明君之期

在乾隆帝为岳飞所作的诗文中，屡见其对岳飞之"忠"的褒扬。如其为岳飞所作之诗中的"读史常思忠孝诚"①、"持身忠总根于孝"②、"相过必纪诗，忠勇实嘉之"③、"武更文双济，忠兼孝两真"④、"飞白精忠早赐旗"⑤、"忠若岳飞，致三木之审勘"⑥等句，皆直指岳飞之"忠"。此外，乾隆帝为岳飞所写的致祭文，将"惟尔公忠"四字置于全文之首。在御制《岳武穆论》中，乾隆帝点评岳飞为"精忠无贰"，堪为经典；更说岳飞"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奉君命，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⑦已然将岳飞塑造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愚忠"形象，实则岳飞是否抱着悲壮的必死之念班师回朝，或可存疑。南巡之时，乾隆帝还常令随行臣工入庙行礼如仪，希望臣子们在这种肃穆的祭拜活动中，接受"精忠无贰"精神的洗礼和感召。

表面视之，乾隆朝对岳飞"精忠"的褒扬，不无潜在风险。这一风险在于，岳飞的"精忠之名"是与他的"报国之志"紧密相连，而其"报国之志"又几乎可以等同于"抗金之志"，清朝统治者恰以金人后裔自居。换言之，乾隆帝此举，某种意义上来说，似是在褒"敌"之精忠。无独有偶，乾隆朝编纂国史《贰臣传》和《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将清初变节的明朝降臣，包

① 爱新觉罗·弘历：《岳武穆墓》，《御制诗文全集》第 2 册，第 497–498 页。
② 爱新觉罗·弘历：《岳武穆祠》，《御制诗文全集》第 5 册，第 59 页。
③ 爱新觉罗·弘历：《岳武穆祠》，《御制诗文全集》第 7 册，第 395 页。
④ 爱新觉罗·弘历：《题岳武穆墓》，《御制诗文全集》第 8 册，第 312 页。
⑤ 爱新觉罗·弘历：《题〈宋高宗手赐岳飞敕〉卷后》，《御制诗文全集》第 3 册，第 387 页。
⑥ 爱新觉罗·弘历：《全韵诗上去入声七十六首古体诗一首（戊戌五）·宋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第 7 册，第 66 页。
⑦ 爱新觉罗·弘历：《岳武穆论》，《御制诗文全集》第 1 册，第 97 页。

括为清定鼎中原做过重要贡献的洪承畴等，判为“贰臣”，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将众多的明朝忠臣义士，包括那些曾经坚持抗清而殉节的明朝英烈之士，如孤军奋战、力竭而亡的卢象升，明亡后绝食而死的刘宗周，清军破城后拒降身死的史可法等人，刻在了历史的功德碑中，无疑也是在褒“敌”之精忠。乾隆帝为何如此作为？或可从《诸臣录》编者之言中略窥一二：“皇上几余览古，轸恻遗忠；念其冒刃撄锋，虽属不知天运，而疾风劲草、百折不移，要为死不忘君，无惭臣节：用加赠典，以励纲常。”[①] 其中“无惭臣节”“以励纲常”几字，点出关键所在。乾隆朝关于臣节的评价标准，正在从一朝之“顺逆”，转向万世之“忠奸”。谢贵安曾指出：“乾隆帝通过编纂史书，设立类传来彰显‘殉节’，贬斥‘贰臣’，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借助历史评论阐述自己的主张，超越王朝和民族界限，以君臣纲常为做人的基本准则和普世价值。”[②] 诚如此言，无论是对岳飞的推崇，还是下令纂修《诸臣录》《贰臣传》等举措，都在在彰显出乾隆帝对“精忠无贰”精神的绝对推崇，而此种推崇超越了中华内部满人一族狭隘而短期的利益视角，体现出一种随时可在“君”“国”之间转化而带有某种永恒价值的政治伦理。

为臣子植“纲常”的同时，亦往往是乾隆帝自我标榜和展示之机。在岳飞问题上，乾隆帝之作为不仅局限于“褒忠”，更有“辨昏”“惩奸”的审判意味在，这与此前金朝曾将所俘徽钦二帝封为“昏德公”“重昏侯”之惩戒用意如出一辙。岳飞作为一名悲剧英雄，其悲剧不仅在其未复中原，更在其死之冤。因此后世汉人在缅怀岳飞时，一般会将对岳飞未复中原之憾，转移至对高宗不辨忠奸之愤，对秦桧残害忠良之恨。这恰恰予以乾隆帝标榜和展示自身的契机，他借机而适时地展现出自己“大中至正之心”。对于高宗、秦桧等阻挠岳飞收复中原的行为，他发出了“夜台犹切偏安愤，想对余杭气未平”[③]、“故乡俎豆夫何恨，恨是金牌太促期”[④] 的愤愤不平之音；对于高宗不辨忠奸、自毁长城的举动，他作出了“褒嘉手敕是谁言，何致终衔不白冤”[⑤]、“本来原是腹心托，十二金牌竟若为”[⑥]、“道济长城谁自坏？临安一木本犹支”[⑦]、“独不知为高宗者果何心哉”[⑧] 的声声质问；对于秦桧，他更是不掩鄙夷地写道：“至今人恨分尸桧，宰树余杭万古芳”[⑨]。乾隆帝将自己置于历史审判官的位置上，其斥责高宗、秦桧的语句，在“大中至正”之余，又与汉族士人、儒家士大夫的立场发生深切共鸣。论及君臣关系，人们往往只会想到臣子需对君主负责。但在完整的君臣伦理范畴下，“忠”是臣子之义务；相应的，“明辨忠奸”也理当是君主应尽之责。乾隆帝编撰《贰臣传》时言及：“朕所以为此言者，非独为臣子励名教而植纲常，实欲为君者，当念苞桑而保宗社。”[⑩] 乾隆帝此言看似是对为君者的规劝，实则亦可视作一种自我标榜。准此来看，乾隆帝大力褒岳贬秦，尤其是严词指责宋高宗“昏聩而不辨忠奸”时，无疑是在向天下后世表明：其以“明辨忠奸”自期甚或自赏。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对宋高宗和岳飞这对君臣此贬彼褒的处理方式，并非个例。明代有两人，后世常以之与岳飞相较，一为于谦，一为袁崇焕。乾隆帝对这两位至死报效明朝以御外侮的忠臣，着眼于他们与岳飞相似的悲壮境遇，都给予颇高评价，而对其所处时代的君王作不遗余力

---

① 《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提要第 1–2 页。
② 谢贵安：《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430 页。
③ 爱新觉罗 · 弘历：《岳武穆墓》，《御制诗文全集》第 2 册，第 497–498 页。
④ 爱新觉罗 · 弘历：《经岳武穆祠》，《御制诗文全集》第 2 册，第 431 页。
⑤ 爱新觉罗 · 弘历：《岳武穆祠》，《御制诗文全集》第 5 册，第 59 页。
⑥ 爱新觉罗 · 弘历：《题〈宋高宗手赐岳飞敕〉卷后》，《御制诗文全集》第 3 册，第 387 页。
⑦ 爱新觉罗 · 弘历：《经岳武穆祠》，《御制诗文全集》第 2 册，第 431 页。
⑧ 爱新觉罗 · 弘历：《岳武穆论》，《御制诗文全集》第 1 册，第 97 页。
⑨ 爱新觉罗 · 弘历：《岳武穆祠》，《御制诗文全集》第 3 册，第 520 页。
⑩ 《清高宗实录》卷 1051，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乙卯。

的批判。针对于谦之死，乾隆帝言："返正之后残加诛戮，英宗可谓少恩矣。"[1] 针对袁崇焕之死，乾隆帝评道："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2] 可见，通过对此类"昏君"施以挞伐，彰显自己"大中至正"之心，乃是乾隆帝处理这类问题的常用方法。

（二）肯定岳飞"恢复之志"——强化疆域一统的"正统观"

对于岳飞的抗金事迹，元朝和清初君主一般讳莫如深。乾隆时期，一改清初的常规定见，对于岳飞的抗金之举，未有诸多避讳，反而颇为推崇，尤为强调岳飞"恢复中原"之志，如其吊岳诗中的"战必骁腾惊北骑，地争尺寸守中原"[3]、"黄龙直抵气峥嵘，燕以南金令不行。正可乘机事恢复，谁知虚力废经营"[4]、"所恨和议行，敌人反间纵"[5]、"夜台犹切偏安愤，想对余杭气未平"[6]、"故乡俎豆夫何恨，恨是金牌太促期"[7]等句，无一不力夸岳飞战功、褒赞岳飞恢复之志。乾隆帝对岳飞"恢复之志"的肯定，隐然契合其以疆域大小为主要评判标准的正统观。

在正统观问题上，杨念群指出："'正统观'的原始蕴意大致包含三项内容：一是任何王朝要想真正获得'居正'的地位，就必须尽可能拥有广大疆域，这是从空间上立论；二是位居'正统'必须依循'五德终始'和'阴阳五行'的运思逻辑，把王朝纳入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系统，这是从时间上立论；三是宋明以来形成的'正统观'多倾向于'攘夷'排外，强化种族之别，这是从内外关系上立论。"[8] 于清朝帝王而言，宋明以来形成的"攘夷排外"的正统观，无疑对其不利，但"疆域"上的广大一统无疑是清朝正统地位的重要凭借，正所谓"惟上天眷顾我大清，全付所覆……幅员袤广，古未有过焉"。[9] 在分析乾隆帝的言论及由此引发的臣子跟风之作后，杨念群如是论及："乾隆朝以后，从帝王到普通士人以疆域大小为标准确认王权是否具有'正统性'，已基本达成了共识。"[10] 深谋远虑的乾隆帝，在强调本朝因"疆域一统"而极具正统性的同时，尚不满足，直欲追溯宋明，于史书中破除"攘夷排外"的正统观，植入其特重疆域一统的正统观。[11] 乾隆帝将"正统"与"偏安"对举，似是将"疆域一统"与"正统"画上等号，不满意于前人"不能得执中之论"。宋明以来形成的"倾向于'攘夷'排外，强化种族之别"的正统观，乾隆帝百计以为扭转。乾隆帝对岳飞"志在恢复"的褒扬，自是他这一叙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帝虽以宋为正统，但北宋疆域狭小，南宋更是偏安，此时"倾向于'攘夷'排外，强化种族之别"的正统观逐渐盛行。有鉴于此，乾隆帝除通过褒扬岳飞"志在恢复"，以正面案例来强调"疆域一统"在正统性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外，亦有塑造反面典型，力责宋高宗苟于偏安之举。乾隆帝在《岳武穆论》《南宋总论》中，都对南宋君主耽于偏安予以严辞批评。[12] 此外，他在《宋高宗》《宋孝宗》诗中，亦讥责宋高宗"忘不共戴天之仇，安苟且一隅之暂"，[13] 赞宋孝宗"初锐意恢复，弗恃长江堑"[14]。可见，乾隆帝将是否有意"恢复中原"，作为评价南宋

---

① 《王直与廷臣共奏请迎上皇帝不怿于谦言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奉迎目》，刘统勋：《评鉴阐要》卷 11，第 7 页。

② 梁志忠点校摘编：《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第 4 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 442 页。

③ 爱新觉罗·弘历：《岳武穆祠》，《御制诗文全集》第 5 册，第 59 页。

④ 爱新觉罗·弘历：《岳武穆祠》，《御制诗文全集》第 4 册，第 545 页。

⑤ 爱新觉罗·弘历：《金鼓洞》，《御制诗文全集》第 2 册，第 510 页。

⑥ 爱新觉罗·弘历：《岳武穆墓》，《御制诗文全集》第 2 册，第 498 页。

⑦ 爱新觉罗·弘历：《经岳武穆祠》，《御制诗文全集》第 2 册，第 431 页。

⑧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⑨ 《清高宗实录》卷 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午。

⑩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⑪ 爱新觉罗·弘历：《御制通鉴辑览序》，刘统勋：《评鉴阐要》卷 1，第 1–2 页。

⑫ 爱新觉罗·弘历：《南宋总论》，《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 1 册，第 98 页。

⑬ 爱新觉罗·弘历：《全韵诗上去入声七十六首古体诗一首（戊戌五）宋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第 7 册，第 65 页。

⑭ 爱新觉罗·弘历：《全韵诗上去入声七十六首古体诗一首（戊戌五）宋孝宗》，《御制诗文全集》第 7 册，第 66 页。

君王的一个重要指标。杨念群提出："'夷夏之辨'在宋代兴盛，即起因于疆域狭小引起的自卑感，也与宋儒企图用文化优势弥补军事衰败的脆弱心理有关。"① 若将此语反转理解，则乾隆帝解决华夷偏见的最好方法即是：既然宋代"夷夏之辨"乃起于疆域狭小所带来的自卑感，那么重新引起民众对国家疆域大小的重视，激发他们对身处疆域广袤的一统之国的自豪感，自然是消弭"夷夏之辨"的妙着。

乾隆帝对岳飞"抗金"的叙述，淡化"御侮"而强调"恢复"，表明此时清帝的站位也从与岳飞对立阵营的非汉族君王，变成了与其同一阵营的后世正统王朝之君，实现了由"外"到"内"的转变。相比于"御侮"语境，"恢复"语境的妙处在于，它导向"统一"而非"对立"。而在褒扬岳飞恢复之志的同时，乾隆帝亦反复强调宋之偏安，无疑是以偏安之弱宋与一统之盛清对比，通过对疆域一统的反复强调，意在凸显清王朝在大一统功业之中着力消除华夷之辨。

（三）望"先贤"风烈——突出"大中华"的整体观

在乾隆朝以前，岳飞的英雄或先贤身份，事实上是牢牢地与其汉人身份绑定一起。且勿论乾隆朝以前汉族和非汉族君主对岳飞态度之差异，即便康熙帝援引岳飞"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的两则臣言，也是专就训诫诸汉人大臣而言。乾隆帝显然对此有所突破。其在《岳武穆论》中称扬岳飞："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可与日月争光矣。"其中"后世"二字，既是对天下臣子的定位，也是对自身的定位。乾隆帝自我定位为岳飞之后世，显然也是视岳飞为自己之先贤。而其以"天下"为"后世"之前缀，实则是说，岳飞非独汉族后世之先贤也，实乃天下后世共尊之先贤。

"天下"是空间意义上之广大，"后世"则是历史意义上之承接。"天下后世"四字，体现了乾隆帝欲混一清朝广袤疆域下各族之历史，将之纳入同一叙述体系之中。这可从他的诗句中略窥一二。如其《谒金太祖睿陵诗》中写道："丕承肆伐追辽帝，善任知人类沛公"，② 将金太祖与辽太祖、汉高祖相类比，三者一为女真族，一为契丹族，一为汉族。显然，在乾隆帝眼里，他们都处于同一套历史体系中，且在这套历史体系中的各族，并无高下之判。再观其平定新疆后《十月朔日颁朔作》等诗歌中，有"尧帝羲和命，大清亿万年"及"伊犁哈萨克，从此入华编"等句。③ 不难看出，乾隆帝已将华夏大地各族群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且以"尧帝羲和"为历史渊源，以"华"为自我定位。虽然乾隆帝并没有给予这个共同体以具体命名，但一个囊括汉、满、蒙等各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事实上已呈"自在"状态。

与乾隆帝坦然以"华"自居有别的是，其父雍正帝的自我定位仍是"夷"，唯其反复强调"夷"只是一个如"籍贯"般的地域概念，然后再借助"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等儒家话语，论证一人是否能成为君主的标准，端在"德行"而非"地域"，并强调大清已达"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不得再"妄判中外"。④ 然而，"华夷一家"话语成立之前提仍是"华夷有别"。显然，雍正帝强调华夷一家，更多地只是强调华夷平等、不得有中外之分，但依然是在原有的华夷框架下进行讨论。

毫无疑问，与其父相比，乾隆帝更加强调自身"华"而非"夷"的属性。乾隆十三年，乾隆帝在关于天主教传教士王安东尼、谈方济"传教案"的谕令中，如是言及："然中国之与外夷，各有体制"，⑤ 可见，乾隆帝实以大清为"中国"，而以大清之外的国家为"外夷"。而在马戛尔尼访华后，乾隆帝在谕英国国王的信中，竟有"天朝自开辟以来……即在京当差之西洋人等，

---

① 杨念群：《诠释"正统性"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读书》2015 年第 12 期。

② 爱新觉罗·弘历：《谒金太祖睿陵诗》，《御制诗文全集》第 3 册，第 107 页。

③ 爱新觉罗·弘历：《十月朔日颁朔作》，《御制诗文全集》第 3 册，第 578 页。

④ 《大义觉迷录》卷 1，《清史资料》第 4 辑，第 4 页。

⑤ 《清高宗实录》卷 320，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己未。

居住在堂，亦不准与中国人民交结，妄行传教，华夷之辨甚严”之语。① 乾隆帝突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固有边界，确立更大范围的“华夷之辨”，以使清朝疆域内的各族夯筑好关于“华”的认同。虽然乾隆帝这种妄贬他国为夷的做法，颇有其局限性，但他“一统疆域为中国、混一诸族入华编”的气魄，仍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格局。

乾隆帝自称为华夏正统，欲消弭世人思想中旧有的华夷偏见，自然不限于空谈，其在位时期的众多举措，都在落实这一思想。清朝帝王极为关注对《春秋》经义的注解，尤其是乾隆帝在对此作诠释时，便贯彻了他急欲消弭华夷偏见的想法。杨念群指出，与康熙帝的摇摆犹疑不同，乾隆帝诠释的要点是强调《春秋》的核心主旨是“尊王”而非“攘夷”。因此，在乾隆帝指导下编纂的《御纂春秋直解》中，“有关‘攘夷’的语句大大减少，虽然仍不时出现诸如‘荆蛮’‘夷狄’之类的旧式表述，但指斥语气的激烈程度却大大降低”。② 当然，体现乾隆帝欲消华夷偏见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伴随着他纂修《四库全书》这一浩大工程的搜缴查禁“违碍书籍”的活动。乾隆帝曾下谕：“文人著书立说……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③ 虽然乾隆帝此谕意在安抚民间藏书者，但从中也可捕捉到，乾隆帝禁书活动的意向书籍，多为涉及南北、华夷对立者，而“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是乾隆帝基于北族身份的委婉提法，实则所禁毁者多为汉人作品中体现“华夷偏见”之作。

岳飞既为南宋以后汉人眼中“御侮英雄”之典范，后世之与其相关书籍大多深染“华夷之辨”的思想，是故乾隆帝所禁“违碍之典”涉及岳飞者不可谓少。比如，前述录有明末清初士人直抒“反清”之意的咏岳诗作《崇相集》《弗来先生诗集》《硕迈园集》《道援堂诗》《启祯遗诗》等，均见于《四库禁毁书丛刊》中。又如，在小说演义方面，如钱彩的《说岳全传》、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传》等，皆因“违碍字词”而遭禁毁。在士人文集方面，亦有不少关乎岳飞而语涉违碍之书遭到“抽毁”。笔者据《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对相关抽毁书目进行了统计，有《汪禹乂集》《王世周集》《折腰漫草》《云东拾草》《缑山集》《处实堂集》《采芝堂集》《石西集》《汪山人集》《由拳集》等。其被抽毁的原因大致如下：《汪禹乂集》“卷五岳墓诗四首，内语意偏谬”，《王世周集》“卷九岳王绘像歌有偏谬语”，《折腰漫草》“卷二岳王墓诗有偏谬字句”。④ 其余各书被抽毁的原因亦大致如此，几乎皆是与岳飞有关之部分存在所谓“语意偏谬”等问题。此外，《四库全书》中对岳飞《满江红》也进行了篡改，尤其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在《岳武穆遗文》中被篡改为“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而在《西湖游览志》《花草粹编》等书，亦遭不同程度的改写。⑤ 此举从宏观上来讲，自然是为了消弭旧有之华夷偏见；而聚焦到岳飞这一个案上，是要将岳飞从“汉家”之英雄化成“天下后世”共仰之英雄。

四、余论：从汉人英雄到中华英雄的转变

乾隆帝对岳飞的倍加推崇，逐渐影响到世人对岳飞的态度。乾隆年间，河南彰德知府黄邦宁在重编《岳忠武王文集》时，便将乾隆帝《御制岳武穆论》《御制武穆祠诗》《御祭文》置于卷首；⑥ 嘉庆年间，冯培所著《岳庙志略》，亦将《御制岳武穆论》及乾隆帝数首咏岳诗放在开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② 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再诠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68 页。

④ 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光绪十年刻咫进斋丛书。

⑤ 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3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471 页。

⑥ 《岳忠武王文集》，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篇；[1] 乾隆朝《江夏县志》中，亦记载了当地岳庙中刻有乾隆帝专为岳飞所作《岳武穆论》等诗文；[2] 河南汤阴的岳庙中，树立着乾隆御诗碑，而《经岳武穆祠》等诗，亦有后来者唱和。经由这些途径，乾隆帝咏岳诗文在民间流播四散，必对时人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乾隆朝以后，汉人论及岳飞时的情感明显有所变化。最显著者在于，自乾隆朝始，汉人以岳飞为“反清符号”的言行逐渐销声匿迹。乾隆朝时，袁枚所作《谒岳武穆作十五绝句》中有一首值得注意，其曰：“小校桓桓道姓施，涌金门外有专祠。雄心似出将军上，不斩金人斩太师。”[3] 此诗所咏对象是替岳飞复仇刺杀秦桧未果的小校施全。诗中将施全“不斩金人斩太师”的行为，赞为“雄心似出将军上”，实则已然将“忠奸矛盾”置于“宋金矛盾”之上。同治帝曾评汉臣田兴恕曰：“该大臣以宋臣岳飞自许，臂刺‘精忠报国’四字。览其所奏，深堪嘉许。”[4] 可见，彼时之汉臣已将岳飞之“精忠”用以激励自己效忠清廷，且清廷亦对汉人自比岳飞之行为颇感欣慰。显然，乾隆朝以后，岳飞“精忠无贰”的精神风范已与满人为主导的清廷主张有效黏合。而非汉各族群体对岳飞的推崇，也在乾隆朝后渐趋明显。通过对相关文集及杭州、汤阴两地诗碑中的咏岳诗的统计，非汉各族所作咏岳诗十之八九写于乾隆朝后。[5] 以上所述之诗，不乏“千古英雄同一哭”“英风震华夏”“万古同怅惋”等语，足以折现当时满、蒙、回、白等各族一道同风之势，以及视岳飞为华夏共同英雄的理所当然之意。可见，在乾隆帝的推崇以及华夏各族进一步交融的背景下，岳飞确如乾隆帝所期，已然成为“天下后世”皆“仰其风烈”的英雄。

于是，在清朝中后期，作为华夷之辨层面的岳飞形象得到创造性再生，岳飞誓死御侮、绝不屈膝的精神，被人们与当时列强入侵、清廷忍辱求和的现实相联系。在时人吟咏岳飞的诗作中，王先谦道：“千载和戎恨，愁连沧海东”；[6] 沈镆曰：“行人莫问和戎事，城阙秋深画角哀”；[7] 樊增祥云：“如今略换人间世，为遣横枝莫向西”；[8] 陈夔龙作：“一谈和议便群疑，策马来瞻少保祠”。[9] 清末反割台英雄、爱国志士丘逢甲，即深受岳飞精神的感召，在《题岳忠武王书前后出师表石刻》中，叹道：“万古云霄开卷见，外家吾愧是孙枝。”[10] 清朝中后期士人们的感慨，与明末时的状况颇有小同之处，但大异之处在于，明末之士多是站在汉人立场上为朝代更替示哀愤，而清朝中后期之人则是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立场为遭外患而表忧思。虽则清季统治日益腐朽，满汉矛盾重趋激化，将岳飞作为汉人反满大纛似又短暂出现，但在大的趋势上，汉族和满、蒙等少数民族关于岳飞的历史记忆渐趋统一，岳飞已然成为整个中华的楷模和英雄。戴逸指出：“乾隆时满汉矛盾已不是困扰国家的一项重大问题。提上日程的是另一个问题，是全民族的认同，即国家在广大地区统一之后，最终组成了中华民族”。[11] 此时的“全民族的认同”，除了政治认同外，显然还有精神维度的认同。而岳飞身上所蕴含的可堪作为“全民族”共同精神的价值元素，特别是“忠诚尽已”“精忠报国”的精神，被乾隆帝挖掘、转化并

---

① 冯培：《岳庙志略》卷首。

② 乾隆《江夏县志》卷 5《祠庙》。

③ 袁枚：《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王英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2 册，第 592 页。

④ 《清穆宗实录》卷 13，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壬申。

⑤ 代表性人物有：蒙古族的梦麟、法式善、柏葰、托浑布；满族除一干皇族成员外，还有富斌、斌良、文冲、宝鋆、毓俊；回族的端木埰；白族的赵藩。参见《大谷山堂集》卷 3、《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 22、《抱冲斋诗集》卷 4、《薜箖吟馆钞存》卷 1、《瑞榴堂诗集》卷 2、《文靖公遗集》卷 3、《友松吟馆诗抄》卷 11、《向湖村舍初集》卷 3。

⑥ 王先谦：《岳忠武庙》，《虚受堂诗存》卷 5，民国十年刻本。

⑦ 沈镆：《岳王坟》，《两浙輶轩续录》卷 39，夏勇、熊湘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985 页。

⑧ 樊增祥：《湖山杂诗》，《樊山集》卷 7，文海出版社，1978 年，第 87 页。

⑨ 陈夔龙：《汤阴岳庙题壁》，《庸庵居士四种・松寿堂诗抄》卷 3，宣统三年刻本，第 12 页。

⑩ 黄志平、丘晨波主编：《丘逢甲集》（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312 页。

⑪ 戴逸：《涓水集》，北京出版社，2009 年，第 188 页。

充分利用，从而对后世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

References

Bao Weimin. “Guanyu YueFei shenhou xingxiang bianqian de jige wenti”(Several research questions about the image change of YueFei after his death). *Zhejiang xuekan*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3(2023).

Dai Yi, *Qianlongdi jiqi shidai*(Emperor Qianlong and his tera). Beijing:Zhongguo renmin chuban she, 1997.

Gong Yanming and Zu Hui，eds., YueFei yanjiu（The Study on YueFei）. Beijing:Zhonghua shuju，2004.

Li An. *YueFei shiji kao* (The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YueFei). Taipei: Zhengzhong shuju, 1970.

Sun Jiang，eds., *Shijian, jiyi, xushu* Event, memory, narration. Hangzhou:Zhejiang renmin chuban she, 2004.

Yang Nianqun. “Quanshi zhengtongxing caishi lijie Qingchao lishi de guanjian”(Explaining orthodoxy is the key point to understand the Qing Dynasty). *Dushu*12 (2015).

Yang Nianqun. “Tianming ruhe zhuanyi Qingchao dayitongguan zai quanshi”(How to transfer the Mandate of Heaven: reinterre 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Unific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Qinghua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6(2020).

The Study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Praising Yue Fei

CHEN Zhaosi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tingmengxuan@163.com)

WANG L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Qianlong Period, Yue Fei was highly praised which surpassed his ancestors and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Regarding its reasons, on one hand, at this point the whole country had been unified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chu and Han had tended to ease, so Yue Fei’s symbolic as Anti−Qing Flag had been weakened greatly;On the other hand, the Qianlong Emperor wanted to implant the concept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to the brains of the ministers and the people, strengthen the concept of the unification of territory, establish a role model for the people and show himself by revering Yue Fei. As a result, Yue Fei as the hero of Han had became the hero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Qing Dynasty, Emperor Qianlong, Yue Fei, Praising highly